

從后殖民主義的脈絡 泛論[中國話語]

姓名：鍾麗娜

學號：1155021803

從后殖民主義的脈絡泛論[中國話語]

姓名：鍾麗娜

學號：1155021803

從[東方主義] [後殖民主義]理論著手分析中國話語的現狀：論述[中國話語]處於被西方線性歷史控制的處境，同時，試圖探討[民族國家]這條道路是否能幫助中國拯救自身的話語權，是否能讓中國擺脫西方線性歷史的控制。

壹·啓蒙主義、殖民主義、線性歷史

康德在《何謂啓蒙》一文指出：[啓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¹ 簡言之，啓蒙是經他人指導後從[不成熟]轉變為[成熟]的過程。康德似乎過於簡單、二元對立地將人類分為[成熟]和[不成熟]；[成熟]的人像老師，有權力指點、教導[不成熟]的[學生]。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是[成長和發展]的過程，這點和黑格爾提出的精神自我展現是一樣的----從黑暗到光明。同時，與啓蒙相伴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

¹ Kant Immanuel,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http://www.sapere-aude.at/What%20is%20Enlightenment.pdf> (accessed May 1, 2013)。參考李明輝的翻譯。

文主義，將人類劃分為[先進]和[落後]----[先進]者有權力指導[落後]者，若不指導，[落後]者必定淘汰滅亡。

這樣的一套啓蒙模式為西方殖民擴張提供了順理成章的理由；啓蒙主義的話語與殖民主義話語相互聯繫，甚至涵蓋了殖民主義話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便成了一套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先進/落後、成熟理性/幼稚不成熟、中心/他者、文明/野蠻。[先進]的西方有權力教導和指點[落後]的東方，甚至可以說西方是[好心幫助]東方擺脫落後。正如黑格爾提到[英國征服中國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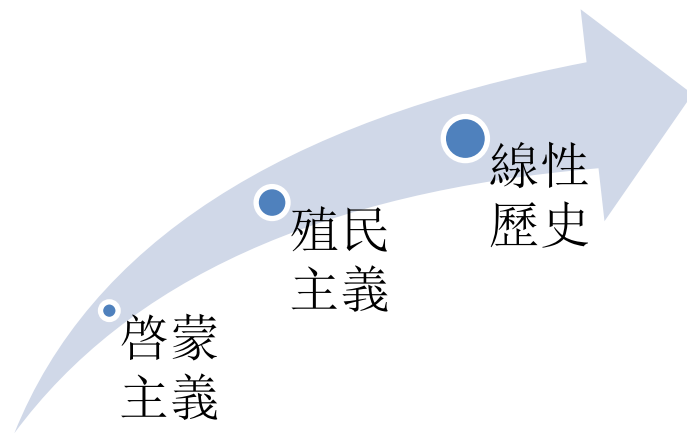
而相對應的線性歷史也是利用了[進化的事物]來克服歷史在無限時間中變化的焦慮。換句話說，推動歷史前進發展的是靠[先進]者，而最終歷史的主體也只屬於[先進]者；[先進]或[非先進]都是由西方定義，[非先進]者不得不承認和接受這樣的線性歷史觀，並且體驗和生存於這樣的歷史觀下。正如杜贊奇所說：[進化論歷史一直是優越種族進步的角錄。按照這樣的標準停滯、落後的種族可以說是沒有歷史，沒有民族。]³ 所以說，線性歷史觀將以[進步]的名義否定、排擠、摧毀[他者]的歷史；而在歷史的終點，[他者]的歷史要麼消失，要麼被迫走上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被支配，被控制，或是如福柯所說的協作----權力運作的最高形式。

如下圖所示，啓蒙主義、殖民主義、線性歷史三者之間是一

²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5。

³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8。

以貫之的西方話語，相互交織形成巨大的話語權力，並且相互掩蓋陰暗面，構成了一套塑造和控制[東方]、[他者]的話語權。三者像是三個親兄弟，分別從事教師、醫生、監獄所所長的職務，在同一歷史舞臺上共同管理和教導[非西方]的學生/病人/囚犯；並且三兄弟之間互相包庇對方的醜陋，只顯示出老師/醫生/監獄所所長的優越知識和威嚴權力。



然而，不同於康德的啓蒙，福柯則認為[許多經驗使我們相信，啓蒙的歷史事件並非使我們成為成熟的成年人，而我們至今也未曾達到這樣的狀態。]⁴ Ania Looma 也提出打著發展旗號的殖民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如種族/民族的分裂，性別壓抑，意識形態等問題。⁵ 由此可見，西方不僅控制和支配[他者]，而且還為[他者]建構意識形態，將[他者]當做一種知識。

貳·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

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正是用[殖民話語分析]揭露了

⁴ 福柯 著，李康 等譯，《什麼是啓蒙》，1984，<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06> (accessed May 1, 2013)。

⁵ 本文不討論西方殖民到底是[進步]還是[去人性化]的問題，所以此處沒有展開論述。

西方為殖民地所建構的一系列知識。

[對臣屬民族的知識，或對東方人的知識，都使得歐洲在統治東方時，方便並且有利可圖。知識帶來權力，而更多的權力，需要更多知識，如此形成了資訊和控制的辯證關係，一種讓歐洲有力可圖的辯證關係。]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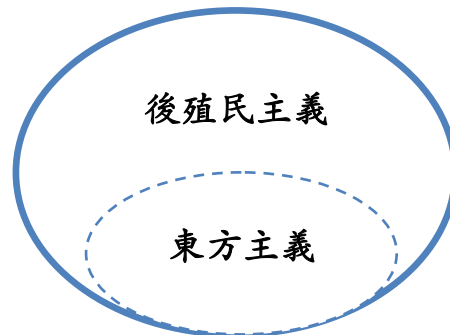
在創造知識的過程中，西方和東方並不是平等獨立的，而是由西方掌握話語權，東方則消失了聲音，處於被動、被塑造、或協作的處境。西方使用啓蒙、二元對立、線性歷史的模式按其幻想塑造東方的[非歷史]，仿佛東方是爲了西方的存在而存在：為凸顯西方人是理性、先進、成熟、有邏輯的人，遙遠神秘的東方人必須是原始、落後、不成熟、邏輯混亂的。東方不是被發現的東方，而是由西方所建構的[東方化]的東方。

如果說啓蒙主義、殖民主義、線性歷史是教師/醫生/監獄所所長的話，那麼東方主義則是批判這[三兄弟]管理[非西方]的學生/病人/囚犯時所建構的刻板印象。東方主義揭露了西方看待非西方的刻板印象，批判西方建構東方，反思西方看待東方時所形成的一系列固定模式和知識。所以說，無論是啓蒙主義、殖民主義、線性歷史，都是西方看待非西方的一套模式，而東方主義則是批判這套固定模式，揭露話語權力在該模式中的運作。因此，如果說後殖民主義是反思殖民的文化後果的一套系統⁷，那麼《東

⁶ 愛德華·薩伊德 著，王志弘 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中華民國八十八年）頁 50。

⁷ 本文不做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定義論述，所以此處不展開討論，只闡述後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的關係。

方主義》正是後殖民主義的一部份，如下圖所示，兩者都是質疑西方建構的[歷史是文明]的線性歷史觀。



另一方面，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也有局限性。第一，兩者雖然都是批判西方話語權，但兩者所用的知識從源頭上來說依然是源自西方。不禁反思，在強勢的西方話語下，[非西方]國家真的發聲了嗎？還是說西方話語的另一面在替[非西方]發聲？[非西方]的主體到底在哪裡？第二，無論殖民地還是未被殖民的地方，似乎都陷入西方強勢的話語權中，似乎都被西方話語所操控，舊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伴隨著歷史，是極為普遍、無所不在的歷史現象。如此一來，後殖民主義的批判對象到底是誰？為誰批判？後殖民主義是不是有可能陷入一種超歷史的虛無處境？如果那樣，還有意義么？

非西方國家到底該如何擺脫線性歷史，擺脫西方的話語操控呢？

貳·民族主義與中國

[黑格爾強調精神的特殊性總是體現在民族之中，只有當一

個民族完全擺脫朦朧暗淡的歷史感悟，如神話傳說中跟詩意理想并在歷史中徹底意識到自我，才能夠獲得成熟的個性。]⁸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個關於歷史、民族和種族的封閉的、相互定義的話語，其中民族合法性的唯一根據是這個民族是否能像赫布斯保姆所論述的那樣，適應或對應歷史的進步。]⁹ [民族成為一個體現能夠推翻歷史上被認為僅代表自己的王朝、貴族專制以及神職和世俗的統治者道德和政治力量的歷史主體。]¹⁰

由上段引文可以看出，民族已經按照啓蒙主義的模式被敘述結構化-----只有[先進、成熟]的民族才能成為歷史的主體。爲了成為歷史的主體，爲了能夠在眾多民族中脫穎而出地顯現優越性，東方[非民族國家]也試圖用啓蒙的模式走向有歷史的[民族主義國家]道路，似乎認為民族主義能夠團結各階層的力量將矛頭指向共同的敵人，誤認為民族主義能讓[沒有民族的、沒有歷史的非西方國家]建立起自己獨有的民族，並且也能像西方一樣成為歷史的主體。以中國為例。袁世凱統治時期，[此種民族主義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能夠保衛（和劃定）國家疆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中央集權國家。]¹¹

然而，民族獨立既沒有導致殖民狀況的終結，也沒有幫助非西方國家擺脫西方的話語控制，也沒能使其成為歷史的主體。這也就說明了歷史並非線性向前發展，並非文明理性的，並非前因

⁸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6。未對黑格爾原文進行考察，引用杜的引文。

⁹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8。

¹⁰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2。

¹¹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151。

後果的。當單一的線性歷史和民族這個主體結合在一起時是矛盾的：因為民族的返祖現象與歷史現代化的目的自相矛盾。換句話來說，民族的返祖現象就是讓人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古老的、共同的、永恆的東西，將其想像成為一個民族共同的特徵；然而線性歷史所描述的是單一向前進的歷史目的，不斷擁抱新事物，否定舊事物。這一前一後的矛盾，正是線性歷史在解釋民族和歷史時的盲點，造成了敘述時間的脫節。

因此，杜贊奇提出用[複綫歷史]代替[線性歷史]。[複綫的概念強調歷史敘述結構和語言在傳遞過去的同時，也根據當前的需要來利用散失的歷史，以揭示現在是如何決定過去的]。¹² 也就是強調歷史是複雜多變的，歷史是交易的，應該更多看到遭否定排擠的[他者]的歷史，更多關注已散失的歷史（儘管散失不可避免，而且很難還原），否定單一的啓蒙線性歷史觀，否定簡單的前因後果的歷史模式。尤其是對於一個古老、多朝代更替、多種族的中國而言，歷史更為多樣複雜。例如 19 世紀 90 年代在封建系統中湧現出的一系列培養公輿論的小團體組織，小茶館、小刀會等表明了中國也同西方一樣存有市民社會，但這些到底是封建社會本有的產物還是受啓蒙影響的產物，還是兩者結合的產物？這已經是一段很模糊，很難撇清的歷史，自然不可簡單地套用西方的線性歷史否定當時中國的封建系統。

不得不反思的是，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啓蒙模式不僅僅是外在

¹²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3。

的東西方二元對立模式，而且也是一種內化、滲透自身的一個過程。反觀中國內部，漢族與少數民族也出現類似的啓蒙模式。正如《左傳》中所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建立自我民族主體時，也就意味著建構和排斥了[他者]的民族和歷史。所以安德森也曾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描述成一種霸權。杜贊奇將民族國家的對內對外的矛盾描述為：[從外部來看，民族國家在明確的、雖不無爭議的領土界限內宣佈自己擁有主權。從內部來看，國家聲稱自己代表全民族所有成員，并由此逐步擴展其社會功能，（此擴展）經常以犧牲地方權力建構為代價。]¹³ 當然，民族國家對外所宣稱的[傳統、民族]不過是民族主義者爲了特定的目的而重新建構的符號并賦予象徵意義。這好比薩伊德筆下所說的[政治知識]，換句話說，民族並非純粹的知識、純粹的民族。

不得不說，民族國家體制性話語依然是西方啓蒙模式的產物。如果被西方定義成[非民族 無歷史]的國家用[民族主義]尋找出路建立民族和歷史時，是不是依然沒有逃脫西方話語？那麼[非西方]國家的主體到底在哪兒呢？[非西方國家]是不是可以不成爲現代化的[民族國家]而尋找出路呢？

結論

本文分析了啓蒙主義、殖民主義、線性歷史的之間的關係，運用後殖民主義的相關理論批判了西方與東方二元對立的刻板

¹³ 杜贊奇 著，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頁 59。

印象，反思中國論述的主體。但是，無論是後殖民主義理論與民族主義都是根源于西方，依然是西方話語的一部份。面對西方的話語，弱者還能發聲嗎？[非西方]的主體到底在哪裡？這一連串的問題值得該話題今後的繼續探討。

參考文獻

杜贊奇 著， 王憲明 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

愛德華·薩伊德 著， 王志弘 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陶東風 著。《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二零零零。

Ania Looma. *Colonialism / Post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http://www.sapere-aude.at/What%20is%20Enlightenment.pdf> (accessed May 1,2013)。

福柯 著， 李康 等譯，《什麼是啟蒙》，1984,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06> (accessed May 1,2013)。